

政治专家 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

李 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巨变，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科学决策成为政府头等重要的课题。为了制订出有效的政策，解决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政府便求助于各类咨询研究机构，思想库随之勃兴。这些思想库既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也不是企业或者政府机构，而是以研究分析内外政策为己任、以影响政府决策和选择为目标的研究组织。对政府来说，这些思想库既能围绕政策制定而进行研究，又能发挥收集材料、处理信息、提供方案的专长，从而有利于国家领导们进行科学决策。实践表明，很多思想库在政策规划方面已获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引起了政府和领袖的注意，其影响也不断扩大。例如，西方最知名的思想库多半在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美国的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外交政策中心^①；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②等。它们在政策咨询方面颇有建树，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政府工作人员最初须在 1~2 个思想库做过工作，不论做助理、工作人员，还是一个研究小组的参与者。否则，能升到政府外交及国家安全事务高级职位的可能性极小。^③

当然，思想库能拿出有见地的政策咨询建议，要归功于政策分析师们（媒体称之为专家或学者，下文称“政治专家”）。他们利用专门知识和专业经验，为政府及各类社会机构服务。以美国思想库为例，总统从竞选到执政，在其内外政策形成过程中总能看到思想库及其专家的影响。出于决策的考虑，新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会把一些复杂而重大的决策问题委托给一个或几个思想库研究。思想库接受政府的委托金，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后提出政策报告为政府服务。崛起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就是这样一批对政府，尤其是对布什政府的决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学者，他们聚集在思想库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宣传他们的思想，促进彼此的友谊，批评共同的敌人，提供他们的政策主张。^④ 布什的中东政策也深受中东学者思想的影响，如土耳其学者尚乃尔·查朴塔伊（Soner Cagaptay）和以色列政治家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本文以布什总统任期为时间段，对政治专家们（包括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的专家和两位中东学者）的类型和工作方式，以及如何影响美国对中东政策做一探讨。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课题“中东思想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中所出现的布什总统均指乔治·沃克·布什。

** 本文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其网址分别为：<http://www.iiss.org/>和 <http://ipc.org.uk/>

② 其网址分别为：<http://www.ifri.org/fronDspatcher> <http://www.ceri-sciencespo.com/>

③ See Robert E Hunter “Think Tanks Helping to Shape US Foreign and Security”,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Mar/Apr 2000, p 36.

④ 参见张春：《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3期，第58页。

思想库中政治专家的类型及工作方式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吸收和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一点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在这方面,美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总统胡佛就设立了大批咨询委员会,为他提供资料和政策建议。罗斯福总统进一步启用一些智囊团企划新政事业,加强了政治专家在政府中的作用。这些智囊团不久就被制度化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即思想库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思想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方面有很大发展。截止到2002年,全世界4500家思想库中约有2500个在美国。^①这些机构成为政治专家用专业知识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建设性资讯和服务的桥梁。这些专家大致可分为“学者政治家”、“政策顾问”、“政府专家”、“政策诠释者”和“政策企业家”^②等。

在这些政治专家中,最有社会地位的是“学者政治家”,系指那些在内阁或者在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据有高位者。他们是政策精英中的知名人物,或因其政策建言能经受住实际的考验,或因专业知识而与众不同。他们不仅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还在政府内阁中占有显赫地位。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利扎·赖斯(胡佛研究所),她的思想诸如“只有在全世界推动民主,才能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不要“多极世界”,只要“一极世界”等,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是“单边主义”的推行者,他于1992年撰写了《关于下个世纪国家战略方向》的文章,遂成为布什的外交政策。这类专家还有许多,如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高级主任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兰德公司),等等。

“政策顾问”,是指那些在大学的或私立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中,专事某项特定的政策研究工作,或者以合同制的方式研究政府部门提出的问题,为政府提供资料、评估政府计划的可行性,并监督计划实施的学者。他们以政策研究或教书育人为主业,不参与决策或担任全职咨询工作。他们提出的理论有时会被整合到政策中去,他们的学生可能走从政之路,从这点来说他们对政府政策会产生长远影响。这些学者多集中在大学依附型思想库里,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前所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和南亚问题研究中心的雷·塔基等。此外,还有专事研究的学者,如高级研究员鲁埃尔·马克·格雷希特(企业研究所)、安东尼·科德斯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罗伯特·科恩(布鲁金斯学会)等。

为了对特定问题提出方案或主张,政治专家们会采用一系列方法。他们将这一过程分为5个部分:政策问题的性质;现有及以往政策的出台;这些出台政策的价值;存在或新的可供选择的出台方案;拟采用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这5个方面涉及政策性能、政策问题、政策未来、政策出台、政策行动等信息。^④有了这样初步的思考后,政治专家们用问题结构法^⑤、预测法^⑥、监测法^⑦、评估法^⑧等

① 参见外交政策研究所“思想库和公民社会项目”的调查, <http://www.fpri.org>

② 参见陶飞亚:《美国“思想库”里的社科专家》 <http://french.hanban.edu.cn/chinese/zhuanti/xxsb/545697.htm>

③ 沃尔福威茨的一个才能就是先于他人预见到危难将至。他的这种才能为他赢得“疯狂先知”的名声。据称在1979年,他就预见了伊拉克可能入侵科威特,并威胁沙特阿拉伯。12年后,美军在海湾地区的“沙漠风暴”行动证实了他的预见。布什曾公开承认沃尔福威茨的学说对官方对外政策的重大影响。

④ 参见汪廷炯:《论思想库》,载《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2期,第25页。

⑤ 即政策分析家制定计划,进入制定政策的时段时,在已有的设想中挑选。

⑥ 即在选择一项特定政策后提供估计与今后发生情况的政策有关的知识,预测在政策形成时最为常用,它帮助观察似乎可能的、潜在的,以及期望的未来;估计已有的建议政策的反应;论证为达到目标今后可能遇到的障碍;估计建议政策的政治可行性。

⑦ 即提供与已有政策效果的政策有关的知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如何最佳执行当前及今后的政策。

⑧ 即提供政策达到适当性能水平时的信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评价他们决策的质量。

方法进行政策分析。为了增进有效性,政治专家们通常会择用多种方法进行决策分析。

美国大选期间,往往是思想库的政治专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或多或少地按照以上步骤推出研究成果,甚至对谋划施政纲领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布什总统尽管对国际事务不甚了解,但有了这些政治专家的努力和配合,他制定外交政策可谓游刃有余。他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也许不能告诉你东帝汶的情况,但我会请教那些有经验的人,比如赖斯、沃尔福威茨、切尼。我的高明之处在于我知道自己哪些不懂,但却有极好的判断力,判断哪些信息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①当然,思想库的政治专家所提供的意见仅仅是可供决策的一种方案、一种前途、一种参谋性意见,而不是决策本身。决策者做出的最后决策可能是专家们提供的各种方案的选择,也可能是各种方案的综合,也可能完全不同于这些方案。

政治专家对布什的中东政策影响

政治专家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当代美国总统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以布什总统第一任期为例,此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主要思想来自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政治专家们。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美国新世纪计划”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杰作”,而“邪恶轴心”一词则源于同时在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与企业研究所任职的前白宫撰稿人大卫·弗鲁姆。^②这些专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布什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鹰派”政府官员,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负责军控和国际战略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和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纽特·金里奇;另一类则是活跃在舆论界、思想库范围内的政论家和社会评论家,主要有《国家利益》的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他的儿子——《旗帜周刊》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新美国世纪计划”副主任汤姆·唐纳利和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等。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新保守主义的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并按照自己的理念绘制了美国改造世界的蓝图。他们对布什第一任期的中东政策影响如下:

首先,这些专家提出了一个重塑中东的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步即推翻萨达姆政权。早在九一一事件前,新保守派就强烈要求推翻萨达姆政权。沃尔福威茨的“防御指南”里就提出了关于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建议。罗伯特·卡根于1995年曾撰文指出,反对将萨达姆赶下台会使其统治下的伊拉克越来越危险。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专家们致信克林顿总统,强烈建议改变对伊拉克的遏制政策,推翻萨达姆政权。2001年10月,珀尔就认为反恐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伊拉克问题,如果反恐战争结束时萨达姆还在台上,那么就不能说“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因为萨达姆是挑战西方价值观的总象征。查尔斯·克劳塞默在2002年年初也分析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于报仇和“伸张正义”的阿富汗战争;第二阶段是在东南亚地区帮助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规模行动;而第三阶段就是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旨在搞掉萨达姆,解除伊拉克可能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③专家们的建议获得布什的认同,他于2002年9月20日请求国会授权其采取合适的行动来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会两院在辩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布什终于拿到了“倒萨”的开战权。

第二步即以改造伊拉克为契机,推行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新保守派思想库的专家们把伊

① 袁鹏、邱伟:《思想库影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9期,第28页。

② See Joshua Brustein “Think Tanks”, March 29 2003 see <http://www.gothamgazette.com/article/issueoftheweek/20030329/200/332>.

③ See Charles Krauthammer, “Redefining the Wa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 2002, p. A25.

朗视为美国政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一大障碍，极力鼓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威廉·克里斯托尔在《旗帜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中东或伊斯兰世界是问题的中心，朝鲜肯定是个危险，但它可能被遏制，它给世界造成的威胁是向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提供致命的武器，而几乎所有的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都在中东。解放伊拉克是为了中东的未来而进行的第一场伟大战役。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是现在的头等大事；下一场伟大战役是对伊朗。”“伊朗是防扩散战争、反恐战争和重塑中东努力的焦点。如果伊朗变得亲西方和反对恐怖主义，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将会随之更容易出现积极的变化，解决巴以冲突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① 迈克尔·里丁也认为，“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应该帮助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的统治者。随着伊朗神权政治的终结，不仅伊朗人民能享受到民主，世界也将受益，从而赢得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场大胜利。”^② 这些政治专家重塑中东的计划如下：用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改造整个中东地区，以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的威胁；为其他地区作出榜样，以便在其他地区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资源石油，以从能源上遏制其他大国的发展；利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建立“美国统治下的持久和平”，即将“单极制度化”等。^③

布什政府接受了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关于“民主改造中东”的设想，并努力付诸实施。2004年11月12日，在与到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就表示：“我坚信民主能促进和平，那就是我为什么在大中东地区推行民主的原因，我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确保在中东实现民主。”^④ 为了搬掉伊朗这个“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绊脚石”，美国大造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舆论，为把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甚至对伊朗动武寻找借口。2004年11月初，当与法、英、德三国谈判核问题的伊朗官员侯赛因·穆萨维宣布伊朗与欧盟达成了暂停铀浓缩活动的“初步协议”时，美国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蒂芬·拉德马克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意图表示怀疑。随后，布什在智利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会议期间，在谈到伊朗核问题时，他说他相信伊朗在继续发展核武器，并认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⑤。此外，为了民主改造中东，布什政府还推动巴勒斯坦的阿巴斯政府与以色列进行和谈，并对叙利亚施加外交压力等。

从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对单边主义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强调优先利用外交手段和大国合作来解决外交难题。中东政策的变化有：（1）试图修补因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遭到损害的欧美关系。布什对到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说，“所有我们希望一起实现的目标都要求美国和欧洲保持伙伴关系。我们是自由世界的支柱。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享有共同的自由价值观。在我的第二任期内，我将努力采取措施深化与欧洲国家的跨大西洋关系。我就职后将立即访问欧洲。我的政府将继续通过北约和欧盟深化与欧洲国家的合作。”^⑥ 布什连任后的首次访问就选择了欧洲，这也显示了布什新政府意欲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急切心情。（2）在伊朗核武器项目上允许法、德、英三国代表欧盟与伊朗进行谈判。布什在2004年11月20日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会议时说，“我愿继续与欧洲国家一起劝说伊朗放弃核武器项目。”^⑦（3）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布什新政府也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从布什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中，不难看出新保守主义学者政策主张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布什

① William Kristo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War on Terror Continues" *The Weekly Standard*, May 12, 2003, p. 9.

② Michael Ledeen, "Iran's Next Revolution", *On The Issues (AEI Online)*, June 1, 2003.

③ 参见姜振飞、姜恒：《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第17页。

④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Blair Discussed Iraq Middle Eas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11/20041112-5.html>

⑤ Mike Allen and Robin Wright "Bush Toughens Line On Nuclear Threats President Singles Out Iran, N. Korea"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3, 2004.

⑥ Ibid.

⑦ Ibid.

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实质仍然是建立单极世界,区别只在于方法和手段。可以预见,布什新政府今后会更加注重手段,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形式(工具)来行单边主义之实(目的)。^①

中东政治专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

政治专家对美国外交思维与政策倡导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知识分子真正决定了美国的政策日程”^②。除了美国政治专家外,不少中东学者对美国的政策也有很大影响力。

(一) 影响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尚乃尔·查朴塔伊

成立于1985年的华盛顿“中东政策研究会”,是一个服务于美国中东利益的学术机构。其中有一个“土耳其研究项目”,主管是一位名叫尚乃尔·查朴塔伊的土耳其学者,他能言善辩,懂近十种语言,擅长研究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和土美关系。查朴塔伊的才华使自己成为影响美国对土耳其政策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他经常撰写相关的时事评论,在媒体上很有影响力。作为学者与战略研究家,他坚决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土耳其是中东大国,特别是北约的军事强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不应在冷战后受到冷落;土耳其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至关重要;土耳其在中亚影响很大,美国可以利用土耳其来增强自己在中亚的影响;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局势的泥潭,可以争取与土耳其合作;美国必须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因为这是保证土耳其的“西方定位”的关键,否则,若土耳其加入欧盟失败,其国内具有孤立倾向的、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增强力量,使土耳其渐渐脱离西方,对美、欧皆不利。查朴塔伊的分析颇有影响力,他认为为了支持土耳其,特别是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中,美国必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帮助土耳其,也就是说,如果希腊和北塞浦路斯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要挟土耳其,美国必须对土耳其施以援手。果然,2005年10月28日,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塔拉特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赖斯。这一消息使土耳其的亲美力量备受鼓舞。在伊拉克战争中,因土耳其没有批准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两国结怨。此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也多次向布什示好未果。但是在查朴塔伊的说服下,美国终于做出了回应。可见,了解查朴塔伊的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对理解土美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二) 影响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纳坦·夏兰斯基

以色列前副总理兼住房和建设部长纳坦·夏兰斯基也是中东政治家。他早在数年前就是美国新保守派的座上客,他对新保守派学者在中东问题上的主张有很大影响力。自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夏兰斯基并拜读了他的《为民主辩护,战胜暴政和恐怖手段的自由力量》后,夏兰斯基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被布什称为“我的精神基因,我的思想哲学”。布什曾在接受完《华盛顿邮报》总编的采访后说:“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虽说不长,可是写得很好。这家伙可是个英雄人物,你知道的,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③在这部书中,夏兰斯基的主张可归结为:强硬的反恐政策和对巴勒斯坦当局(如果不能对阿拉伯世界)实施民主化。在自由问题上,他认为,自由力量有3个源泉:个人内心自由的力量;自由社会的力量;自由世界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任何社会,自由都不是绝对的。^④区分自由社会与恐惧社会的标准即所谓的“镇中心广场测试”^⑤。另外,只有自由社会才可以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自由和民主符合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中东和平可以实现,但前提是巴勒斯坦首先要实现民主。他强调,自由世界的领袖可以成为推动民主

① 参见姜振飞、姜恒:前引文,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第17页。

② Martin Anderson *Revolution*, Harcourt 1988 p.8.

③ [法国]达尼埃尔·韦内:《影响布什的书》载《世界报》,2005年1月26日。

④ See Natan Sharansky, *The Case For Democracy -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and Terror* PublicAffairs 2004. <http://www.publicaffairsbooks.com/publicaffairsbooks/cgi-bin/display?book=1586482610>

⑤ 指所有人能否毫无顾忌地在镇中心广场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两者的界限是该社会是否允许不同政见存在。

转变的巨大力量。自由世界不应该坐等独裁政权接受改革，或者依靠国际机构的支持来推行民主。自由在全球的传播需要美国的激励和领导，在它的带领下，全世界的民主政权将粉碎当今和以后对这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专制者。^① 这本书对于发誓与恐怖主义斗争到底而又缺乏充分理由说服民众的布什总统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布什向所有到他办公室的人推荐这本书，并把它确定为“白宫必读物”。2005年1月20日，布什总统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将“自由”这个词重复了43次，其“自由经”并非是受到政治前辈的启发，而是受到夏兰斯基的影响。^②

夏兰斯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各方合力促其内部发生根本改变，以及广泛地普及民主和自由。他曾竭力主张排挤、打压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施行高压政策，因此，他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强硬派。^③ 2006年初，巴勒斯坦民主选举前，夏兰斯基就提出， Hamas若要获得支持，就须首先做到两点，一是必须坚决放弃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宣布不再从事恐怖活动；二是必须致力于为巴勒斯坦人创建一个自由社会。如果巴勒斯坦新政权不遵守这些条件，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自由世界将采取积极行动，与巴勒斯坦新政权进行斗争，不承认它的合法性，撤回资金并收回已做出的让步。^④ 2006年3月，Hamas在选举中获胜，夏兰斯基认为这是只注重民主形式、不注重实质的结果。他指出，美国在中东推进民主的计划似乎已受到重创。伊拉克、埃及，特别是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最近的选举结果使许多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美国的计划带有严重的误导性，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他呼吁民主世界应利用自己在道义、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帮助中东建立自由社会，而不是推动尽快举行选举。当然，协助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生根发芽需要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提出，“民主派人士都是我们的伙伴，我们可以通过拒绝支持那些压制他们的人来支持民主派人士。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在我们的声明和政策中宣示，努力在他们的社会内扩大自由，用既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方式来支持那些民主派人士。”^⑤ 尽管夏兰斯基的理论在学术上并没有很大价值，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甚至有媒体指责他是一个典型的“极端右翼分子”，但夏兰斯基“以暴易暴”的思维却意外地成为布什“饥不择食”的反恐武器。

从以上例子看出，政治专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甚至左右美国外交策略的方向，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结 语

众所周知，外交决策的出台是一系列研究和考察的综合性结果，会随着环境和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其中真正决定国家政策的是国家利益，但我们也不能轻视政治专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因为社会科学及辅助性政策研究机制的紧密结合，为政府及大企业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科学的支撑，大大地减少了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美国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它在决策过程中成功地吸收和利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过我们也观察到，政治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思想，评估这些答案，即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答案为中心。^⑥ 可见，政策分析只是政策传输过程之始，而非终结。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成红)

① See Natan Sharansky, *op. cit.*

② 参见《布什挟“自由”以令天下引起世界不安》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01/content_2534074.htm

③ 参见黄培昭：《夏兰斯基：布什外交的精神导师，大力鼓吹自由民主》载《环球时报》，2005年3月23日。

④ 参见[以色列]纳坦·夏兰斯基：《忽视巴勒斯坦人需要的代价》，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2月1日。

⑤ 参见[以色列]纳坦·夏兰斯基：《民主能结束暴政吗？》，载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3月5日。

⑥ 参见汪廷炯：前引文，载《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2期，第26页。